关于好智库的 12 条标准

中国科协王春法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北京 100863

摘要：[目的/意义]近年来，国内智库热催生了大批自称为智库的研究机构，也使智库评价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是，究竟什么样的智库是好智库，似乎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方法/过程]为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本质要求，正确引导智库建设方向，本文从现代智库的功能作用与运作机制两个维度出发，结合中国科协科技创新高端智库建设实际，深入分析了智库的价值取向、运作机制、影响拓展等重要方面。[结果/结论]本文提出了好智库的 12 条标准，并对我国智库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发展趋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智库;标准;功能作用;运营机制

分类号：G301

Analysis on 12 Criteria for Excellent Think Tanks

Wang Chunfa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863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a lot of institutions call themselves think tanks and the work of think tank evaluation becomes a hot topic in China. However, there is no impersonal criterion for excellent think tanks till now. **[Method/process]** With the aim of grasping the essential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leading correct direction of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d some key aspects of value orientation, operation mechanism, fund raising, and influence extension, etc. of modern think tanks. **[Result/conclusion]** Based on functional and mechanism analysis and the practice of CAST, this paper put forward 12 criterions for excellent think tanks, and also gave some judgments and opinions about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in China.

Keywords: think tank criterion function operation mechanism

所谓智库，最初专指二战期间美国军事人员和文职专家聚集

在一起讨论战争计划及其他军事问题的保密室，以后转而用以称呼那些独立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各种机构。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认为，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又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也是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 根据安德鲁.里奇的观点，所谓智库就是“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基础、非盈利性的政治组织，它们生产并且主要依靠专家的意见和思想来获得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1]。

我国的智库热是从本世纪之初特别是第二个 10 年开始兴起的。201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各类智库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央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刘延东同志在 2013 年 5 月 31 日也突出强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要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坚持求真务实、奋发有为，多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针对性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努力做改革发展决策方案的建言者、政策效果的评估者、社会舆论的引导者[2]。2015 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

了我国智库的 8 条标准，即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有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条件等[3]。这 8 条标准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基本标准，而且较多地多管理上或者说实体机构上提出了要求，但对于智库的功能作用、运作机制缺乏明确具体要求。

那么，什么样的智库才是好智库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在 2008 年提出了智库的标准，即在某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与该领域的积极变化直接相关；知名出版商乐于发表该智库的研究成果；有能力吸引并留住精英学者和分析家；有能力与研究领域内的决策者、媒体、学术机构的精英接触；学术声誉(资质认证，在主要学术书籍、杂志、会议发表文章数，被引用次数)；媒体声誉(媒体曝光频率，接受采访、被引用次数)；在政策制定者中的声誉(参与咨询会、正式约谈、政策参考简报、议会作证的次数)；财务资源(会员缴费，赠款，政府和私营部门合同，净收益)；适应并满足资助者要求的能力；产出的数量(政策建议，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参加会议，智库成员出任官职的人数)；政策建议被决策者采纳的次数、获奖次数以及担任政府顾问的智库成员人数；各项研究和活动的实用性；在政策分析上

的创新能力；有效填补决策者的认知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为政策制定过程中贡献新的考虑因素；成为某个领域或议题的知识和人才聚集地；成功打破决策者和公众的固有思维等[4]。2016 年全球智库指数（GGTTI）在综合考虑资源指标、利用率指标、成果指标、影响力指标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包括智库领导层的才能和责任感；智库员工的质量和声望；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声誉；招募和留住精英学者、研究员的能力；学术表现和声望；出版物的质量、数量及受众范围；智库的总体成果；网站和数字平台的展现；媒体声誉和智库的社会影响力等在内的近 30 项评估标准①。应该说，这些标准比较多地关注智库的功能作用和运行机制，但总体上显得琐碎零散，看起来面面俱到，很容易转化成为量化指标，但还远远谈不上全面深刻。我个人认为，判断一个智库优良中差，最主要的是下面这样一些标准，概括起来有 12 条之多：

一要有立场。智库从来不是也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智库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它必然要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和价值观，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比如对自由市场的信仰，对政府干预的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等等。这种信仰不一定是挂在口头上天天讲的，但一定会在智库研究的视角假定、方式方法、研究成果等各个方面展现出来。从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表面上智库大都宣称是非党派的，实际上都有

①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全球智库报告 2016》，2017 年 1 月 25 日发布。

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党派偏好，或者是保守的，或者是自由主义的，而且它们这种坚持往往比较坚定，决不会朝三暮四、观点立场多变，既不会因为政府更迭而变化，也不会因为资助来源的影响而变化。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西方现代智库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通行和相对稳定的规范标准、模式经验、运行方式，其主要特点是真正独立自主：机构自建、人员自选、经费自筹、研究自主、观点独立、建言独到、责任自负。它们往往以高质量的独立研究成果，影响政府决策、影响公众舆论、影响市场走向、影响国际社会[5]。但是，如果循着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这条线索来看，这种所谓的智库独立性实际上是很表面化的，其实质是意识形态多元和价值追求多元的外在反映。忽略了这一点，就看不清西方智库的本质！

二是要有理论。理论方法是智库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的外在展现，也是其研究视角、基本假定、分析方法、政策建议由以形成的基本依据。一般来说，智库都应该有其长期专注并且比较专长的研究领域，智库的影响力主要源自它的专业和专注。唯其如此，智库才能够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自成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包括独特的研究视角，科学可行的分析方法，以及符合逻辑、给人启示的研究结论以及立场鲜明的政策建议等等。这种理论方法不是定量定性等工具意义上的研究方法，而是包含着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偏好的理论方法，它源自学术研究，又与纯粹的学术研究有所区别，或许称之为理论分析框架更为合适些。

比如，迈克尔.波特认为影响一个国家某一个行业国际竞争优势主要有六个因素，即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相关产业，企业策略、结构或竞争对手，政府行为，机遇，因其画在图上像一块钻石，故称钻石模型。这一理论模型成为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进行政策咨询的基本方法[6]②。由此可见，系统完整、逻辑自洽、能给人以启示的理论体系即可以指明智库的价值信仰，也为智库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还可以昭示政策研究与分析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方法就称不上好智库。

三是要有数据。现代社会问题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用数据说话，无论在哪个国家，数据都是智库最可宝贵的资源，因而获取数据、整理数据、加工数据、分析数据就成为智库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数据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数字，而是指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一系列数字、案例、文本等等的集合，因而每个智库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可以是来自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或者经过学术界研究分析之后形成的二手数据，也可以是智库通过问卷调查、案例调查等自己的数据采集机制形成的数据。无论如何，这些数据需要较长时期的可靠积累形成相对完整的历史数据系列或者政策历史文本之后，才有分析的价值，而这种数据整理与分析的需求又促成了智库研究方法的多元探索和深入。所以说，基于数据的分析研究是现代智库研究的核心，不能产生数据的调查是无意义的调查，没有数

②事实上，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第 1 章开篇即说，国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也是国家如何刺激产业改善和创新的关系。

据就没有判断，更没有观点和思想，一句话，没有完整系统的资料和数据系列就没有智库研究[③]。

四是要有专家团队。智库是出思想的，思想来自专家的基于专业视角的深入思考，因此，无论中外，智库一定要有一批在相关领域有研究、有思想、有影响的杰出专家。这些专家未必是同一专业的，但他们一定是相关领域内的一流专家，既具有专业基础，又具有宏观视野，既要注重学理，也要注重实际包括国情实际和政策实际，对于相关政策的演进及其趋势也很了如指掌。如果一个人无法具备这样的知识结构，那就需要调整人员结构来弥补了。智库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通过通过专家团队差异化的专业背景一定来形成立体化的知识结构，从而弥补个体专家的专业领域过窄的局限。据说有人曾经问过美国前宇航局局长：你把那么多的宇航员送上太空，对此你有何感想?他只说了一句话："不能让同一个专业的人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共餐。"姑且不论这事真假如何，但它至少说明了通过人员结构调整进行知识互补以形成完整知识体系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因为，同一个专业的人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共餐构成的是知识的平面结构；而不同专业的人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共餐，构成的是知识的立体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日本发明家声称综合就是创造。

五是要有组织智商。个体有个体的智商，集体有集体的智商，这也就是所谓组织智商，即把团队成员的个体智慧凝聚上升

[③] 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知名智库以及 OECD、UNESCO 等国际组织都高度重视数据分析和利用，美国联邦政府甚至建立了"Data.Gov"网站开放大量公共数据并鼓励挖掘。

为有组织的集体智慧。组织智商不是个体智商的简单加总，而是通过一定机制方式把个体智慧凝聚起来，升华为集体智慧，并且以组织的名义展示或者表达出来，这既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工作机制，从根本上决定着智库的成败。在这里，组织智商的核心是领军人物，它是组织的灵魂人物，也是组织的大脑，发挥着作出战略判断、提出思想观点、组织力量进行深入研究、对不同观点建议进行筛选判断、引导组织达成共识的作用，同时他也会提出合适的选题、明确的观点、恰当的报送形式和渠道。组织智商的关键机制是把个体智慧凝聚上升为有组织的集体智慧的能力、水平与方式方法，这里最常见也最主要的是头脑风暴式的各式会议，规模一般不要太大，但充满理性质疑，从中既有各种不观点的激烈交锋，也可以彼此理解、说服、形成共识、提出好的对策建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库集成和展示的集体智慧与专家本人的个体智慧完全不同，全部由具有较高水平研究者组成的团队未必具有较高的的组织智商！这种组织智商，不仅体现在智库提交的研究成果上，更体现在它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上，特别是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至关重要。很多人羡慕美国的旋转门制度，实际上这一制度的最重要功能就是把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集中起来，因而是一种智慧集成机制。

六是要有高水平研究成果。智库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指智库的思想观点、战略判断和政策建议等，它们必须具有一定的外在表

现形式，包括内部报告、研究论文、报刊文章、媒体采访等。一般来说，形成这种智库成果首先需要杰出人物发挥独特作用，但又不仅限于杰出专家的个体智慧，因为智库成果一定是集体智慧的产物，而且这种成果必须经过严格内部审查机制之后才能作为智库集体智慧的产物公众之于众，或者通过恰当方式呈送决策者。比如说，兰德公司就提出了高质量研究十个标准，包括：问题应该清晰准确表述，研究目的应该非常清楚；研究方法应该很好地设计并严格执行；研究应该显示对相关研究的理解和掌握；充分掌握数据和信息；研究的假定应该明确合理；新发现应促进知识积累并对解决重大政策问题有所助益；政策含义和建议应该符合逻辑，得到新发现支持，并且用适当说明给予透彻解释；报告文本应该易懂，结构清楚，而且语气平和；研究应该引人关注、有用，且与利益方和决策者密切相关;研究应该客观、独立且均衡。只有经过内部审查机制被认为符合这十条标准的研究成果才能以兰德公司的名义按照特定程序呈交委托方[7]。由此可见，智库成果所体现的既有研究团队的远见卓识，更有审查专家把关机制所展示出来的严肃认真负责和对政策趋势的准确把握，忽略了任何一方的功能都是不完善的。

七是要有研究风格。智库的研究风格既体现在研究主题的确定和观点的把握上，也体现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话语体系的运用上，而观众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智库的政策主张和话语体系！一般来说，研究者的话语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学术上的

话语体系，大多比较抽象，要回答的是在学理上应该怎样？满足的是学术研究者的好奇心。大多数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学者和著作可归入此类。二类是政策上的话语体系，一般比较通俗、具体，要回答的是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应该如何？决策者和政府官员是这套话语体系的主要持有者，政策研究报告和政策文件可归入此类。三类是政治上的话语体系，讲究的是思想正确和立场鲜明，要求的是原则性和普适性。政治家是这种话语体系的主要持有者，不讲逻辑推理，只讲判断主张，连续判断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语言逻辑的力量，因而有很强的感召力。由于智库研究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政策研究，必须使用政策上的话语体系来阐释和表述，这样的政策话语体系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智库影响力的差异[8]。

八是要有人脉网络。智库工作不仅仅是专业研究工作，还有编结社会网络的工作，从研究选题的来源到研究工作的开展再到研究成果的呈现，无一不在网络之中进行和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脉就是智库研究的信息来源，人脉渠道就是智库研究的选题指南，人脉就是智库研究的资助来源，人脉就是智库社会影响力的延伸路径和延伸方向，人脉网络不是庸俗的利益关系，而是是智库研究的社会网络。为什么各类智库普遍愿意延揽退休官员加盟？这一方面是要借重他们丰富的决策经验和宏观形势把握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借重他们的广泛的人脉渠道，发现问题、拓展呈送渠道。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江濡山认为，每个知

名的智库机构都精心编制了三张网络，包括全球同行研究网络、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其中不乏政府高官、议员、财富大亨、公关代表等)和自成体系的情报信息网络[9]。这样三张网虽然不是每个智库中人都可以享有或者参与的，但确实是智库重要的核心资产，智库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脉网络的广度和深度。

九是要有社会影响。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而智库的影响力既取决于它的人脉网络，也取决于它的研究质量与水平，是否具备公信力、创新力、专业力和传播力是能否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大国智库的先决条件。这种影响力的展示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内部报告直接产生影响，二是通过引导社会舆论间接产生影响。比如说，兰德公司每到年底都要回顾一年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重点思考三个问题：一是所研究的问题是否已经接近和进入政策议程？二是研究和分析是否为决策者和广大民众知晓，并由此提高了政策讨论的水平？三是研究成果是否导致政策内容与实践的显著变化？有学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主要以专业、客观、独立的方式提出公共政策主张，帮助决策者制定和推行政策，并就有关政策进行论证、评估[10]。另一方面，好的智库还应该在政府、公众和政策研究界之间搭建公共政策探讨的平台，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加强政府官员、公众、政策研究学者之间的观点沟通与交流，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供更多渠道[11]。也就是说，好的智库能够引领社会思潮，其实影响社会公众比影响决策者更难，也更为重要，因

为它会影响民意、代表民声，因而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冲击力。我们说智库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服务科学决策、引领社会思潮，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如果不能对决策者产生影响，或者不能对社会公众的思维模式和思想动向产生影响，那么，这样的智库是很失败的，不要也罢。

十是要有资源动员能力。智库需要相对充裕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力资源以及社会资源等等来完成研究和推介任务，其中最重要的是财力资源，也即经费资源。有了经费资源就可以聘用一流专家，可以获取优质数据资料，可以提供良好的办公条件，也可以开拓更多的社会通道。正因为如此，所有智库都必须建立可靠的筹资机制来提供稳定的经费来源。从大的方面来说，所有智库的经费来源无非是三个渠道，即政府、企业和社会。在日本，政府每年用于智库的经费约占日本科研经费的 1%。但是，无论智库经费来自何处，智库一般都应尊重与资助方就研究成果提交或发表的时机、方式、范围等做出的约定，但资助方不应以任何方式该妨碍智库独立得出自己的判断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智库会把大约 30%的经费用于研究，70%用于发表、传播或者说推广。这显然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古谚所隐含一个真理：酒香也怕巷子深。 之所以说国内的智库大多是功能性智库而非机制性智库，主要就是说它们缺乏基本的筹款机制，无法为其智库产品或者说影响力赢得稳定的可持续的资金支持[12]。

十一是要有阵地。智库活动需要有载体，但智库成果的展示

需要有平台，或者说需要有阵地，而且必须是面向社会开放的。大体说来，智库研究完成后，成果展现形式无论是内部报告还是文章视频，都需要有刊物来发布研究成果，有渠道能够呈送研究报告，有会议论坛能够公布智库观点，有网站可以及时发布消息。凡此种种，都需要智库具有开放性，即智库必须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智库要对社会开放，让社会公众参与讨论政策问题，定期发布智库研究成果，可以在第一时间知晓和享受最新智库研究成果；要对国际开放，保持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要对同行开放，交流最新信息和最新成果，迸发思想火花，激荡自主创新的源头活水。只有这样，智库才能够真正影响和引领社会舆论，进而从社会角度对决策者施加更大的影响，使社会心态更加理性，决策过程更加科学。

十二是要有文化。智库文化一定要是一种理性平和的文化，对于智库研究相关方持一种理性平和的心态，即智库作为思想的生产者拥有提出建议或者不提出建议的权力，决策部门作为政策制定者也有接受建议或者不接受的权力，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不能把是否获得领导批示作为唯一标准。尽管如此，智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面对重大政治社会科技问题必须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政策意识；要有突出的战略思维；要体现出多学科的交叉融合，避免从单一视角提出政策建议；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公开、公正、透明与问责是现代科学咨询组织的关

键条款。同时社会上也不能要求智库对其政策建议承担法律责任。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是 2009 年意大利拉奎拉地震时，由一位政府官员和六位意大利科学家组成的评估委员会因为错误预测并提出事后证明不正确建议而被判入狱，其中六位科学家的判决在 2014 年最终被推翻[13]。这一案例既说明科学家履行相关社会责任的极端重要性，也说明科学家在履行相关社会责任时应该抱持一种慎重、负责的态度，不应该过于轻率，同时还说明社会对于科学家履行相关社会责任应该具有一种理性、宽容的良好心态--毕竟，做出判断、提出建议固然重要，但智库专家毕竟不是决策者。智库提出的观点应该理性中道，不应过于偏激，保守僵化固然不可取，哗众取宠更不可取。理性意味着符合科学、符合逻辑，中道意味着要代表民意，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

这 12 条标准是以实体研究机构已经存在为基本假定而提出来的，因而主要围绕着如何健全和发挥智库的功能机制展开论述。对比上述 12 条标准，应该说目前我国智库发展还存在一些明显的差距或者说缺陷，主要表现为：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和机构都以做智库为追求目标，但事实上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是完全不同的，并不是每个社会科学类研究机构或高校都有条件成为智库的；智库研究中产生的观点太多，而深入详实的研究论证太少，战略视野不够开阔，思想性不够，缺乏理论框架上的重大突破；只追求做功能上的智库，而不是机制上的智库，智库产品单一，只是提交报告或论文，而没有其它的产品形式；缺乏意识形态和

价值追求上的坚定性，人云亦云，观点立场因人而变、随时而变。从智库发展的大环境来说，特别令人不安的一个现象就是，尽管许多智库缺乏积累，智库研究人员也不愿意扎扎实实地深入研究，仍有许多机制热衷于排名评比，进入前十前百之类的，岂不知好智库是干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智库排名其实毫无意义！

未来中国智库发展的大趋势将会如何？我个人认为，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已经吹响、全国上下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拼搏的大背景下，党政部门对智库成果的需求将会保持强劲增长态势，智库成长的社会条件也会越来越成熟，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智库数量会呈现出较大幅度增加趋势，大型企业对智库的支持力度也会逐步加大，甚至来自国外的企业资助也会增加，智库影响力会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经过最近两年的智库热，我国智库将进入持续分化时期，机制性智库和专业性智库会逐步增加，高校智库会有较大发展，智库与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流动频度会加大，一些旗舰性的综合性智库将会强者愈强；与此相适应，智库产品越来越多样化，影响渠道也会形成多层、多元态势，出版物、媒体、论坛等会更加活跃，智库在影响社会舆论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对中国智库的发展前景是比较乐观的，关键是需要有一批智库领军人才快速成长越来，在我国智库事业中发挥中坚作用！

参考文献：

[1] Rich, Andrew. U.S. Think Tanks and the Intersections of Ideology, Advocacy and Influence[J]. NIRA Review, 2001 , 8(1): 54-59.
[2] 刘延东．发挥高校独特优势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贡献力量[N]．光明日报, 2013-05-31(011).
[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EB/OL]. [2017-01-15]. 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5-01/21/c_133934292.htm.
[4] McGann, James G. 200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Report[EB/OL].[2017-02-09]. http://www.gotothinktank.com/dev1/wp-content/uploads/2013/07/2008-Global-Go-To-Think-Tanks-Index-Report1.pdf.
[5]陈永杰．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纠正异化、制止乱象[N]．经济观察报, 2015-05-25(006).
[6]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第 10 章．
[7] 兰德公司关于高质量研究的的十个标准[EB/OL].[2017-02-09]. http://www.rand.org/standards.html.
[8] 王春法．关于创新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M]．中国科协调研动态汇编，北京：北京年鉴社，2010.
[9] 江濡山．中国高层需要什么样的智库？[EB/OL]. [2014-09-03]. 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40709/132319652746.shtml.
[10] 李伟．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之路[N]．人民日报, 2014-04-22(007).
[11] 王莉丽．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智库思想市场[N]．学习时报, 2013-12-16(006).
[12] 王春法．美国思想库的运行机制研究[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2):29-41.
[13]意大利为科学家平反：漏报地震不构成过失杀人罪[EB/OL]. [2016-09-03].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1111/c1002-26005651.html.